

主题研究: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走向与变革

编者按:在中华民族长期的繁衍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灿烂的古代教育,并涌现出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大教育家,为人类文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近代以降,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教育的冲击和浸润下,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革的基础上,中国传统教育开始了缓慢而不可逆转的变化。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亦称早期现代化)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胁迫下,拉开了沉重的帷幕。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把振兴祖国、挽救民族危亡的厚望寄托在教育的改革上,上下求索,矢志不渝。于是,有所谓“教育救国”的社会思潮,跌宕起伏,绵延一个多世纪,流风所及,至今犹存。如何正确看待和分析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传统教育的历史走向?如何科学认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所发生的种种变革?这既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重新评价的历史问题,更是一个与当代的教育改革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现实问题。因为只有对“昨天”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才能更好地把握“今天”、展望“明天”。浙江大学中外教育现代化研究所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内率先开展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7卷本)、《近代教育与社会变迁研究》(5卷本)、《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卷》等学术专著,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容纳各种观点,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就中国教育现代化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本刊特开辟“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专栏,欢迎海内外学者共同参与探讨。

本期专栏由浙江大学“中外教育现代化研究所”供稿,并特约该研究所所长田正平教授担任栏目主持人。

评列文森的近代中国史观

——对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思考

田正平¹, 朱宗顺²

(1. 浙江大学 教育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2. 中南民族大学 教育学系,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列文森的近代中国史观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得到充分展示。列文森认为:儒家思想在近代中国所经历的实质性变迁,只有在西方冲击造成传统断裂的背景下才有可能发生;儒教从普世性价值变为历史研究的材料乃至博物馆的陈列物,构成了近代中国思想变迁的基本图式;儒教和君主制之间张力链条在近代的断裂,是儒教衰亡的重要原因,伴随儒教衰亡的是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价值的冲突;被转换或被抛弃了的儒家传统,导致了反映中国思想变革结果的共产主义变体的产生。历史认识主体的凸显和思想史研究路向,是列文森近代中国史研究的特色,他的近代中国史观深受欧美史学理论、现代化理论以及西方中国研究传统的影响,并在其早期著作中进行了初步展示。

[关键词]列文森;近代中国史观;儒教;中国现代命运

[中图分类号] G40-09; K1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4)01-0005-08

[收稿日期] 2003-01-05

[作者简介] 1. 田正平(1944-),男,山西应县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近代化及中外教育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 2. 朱宗顺(1967-),男,湖北巴东人,中南民族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教育近代化、中外教育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

列文森(Joseph Richmod. Levenson, 1920—1969)在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中有“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之称,被视为美国中国史研究中“传统/近代”模式的宗师。他的中国研究著作主要有三部:《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Liang Q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卷)(*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Calif Univ., Vol. I, 1958, Vol. II, 1964, Vol. III, 1968)、《中国历史》(*China—An Interpretive History*, 1969)[1](p.183)。其中《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以下简称《命运》)是其最具影响力的巨著,全书共分三卷:第一卷讨论中国近代的“思想继承性问题”,着眼于儒教在近代中国步步后退至衰亡的主题;第二卷从儒教和君主制之间相互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君主制的衰亡问题”,为其儒教衰亡论辩护;第三卷进一步探讨儒教衰亡的“历史意义问题”。作为“局外人”的列文森,在《命运》中以独特的历史叙事方式和对儒教在近代中国衰亡图景的宏观展示,使其近代中国史研究既有别于当时美国中国研究界以费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为代表的“冲击/回应”模式,又与20世纪70年代前国内的近代史研究大异其趣。本文拟以列文森的《命运》为据,对其近代中国史观进行评析。

一、近代中国的变迁是“西方势力侵入”的结果

近代中国的变迁何以可能?中国在十七八世纪出现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它表明即使没有西方工业主义的催化作用,这个看上去平稳的、传统的中国社会,凭借自身的力量也将迈入一个具有科学取向的社会吗?”[2](p.3)列文森通过比较明末清初的经验论与西方近代科学的异同,悲观地指出:尽管中国曾有过重要的科学成就,但儒家文人整体上对科学缺乏热情,中国近代早期的思想传统中至多只有“科学的火花”,缺乏那种“汇入世界潮流的、不断积累起来的科学传统”[2](pp.11—12)。要使中国迈向科学取向的社会,只有“改变他们的文化价值”,将中国置于“传统的断裂”环境中。那么,中国能否凭借自己的力量造成“传统的断裂”呢?列文森在评价清初经验论对宋明理学的批评时指出,这种批评“仍是中国传统世界内部的分歧,它证明的是传统的稳定性,而非传统转化的象征”[2](p.8)。因此,造成传统断裂的动力只能来自外部。比如儒家文人的“非职业化”传统,只有当中国社会在西方的压力下开始沿着西方的道路发生变化时、当西方的价值观取代儒家文人那种与非职业化取向相联系的美学价值观时,非职业化观念才会为职业化观念所取代。不仅科学和职业化观念的确立有赖于西方的推动,而且儒教在近代所经历的从普世性文化价值到博物馆的陈列物、从“词汇”被丰富到“语言”被颠覆的变迁,也只有在西方势力侵入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他认为:只要一个社会在根本上没有被另一个社会所改变,那么,外国思想就会作为附加的词汇在国内思想的背景下被利用,但是,当由外国势力的入侵而引起的社会瓦解开始后——这种情况在中国而不是西方发生过,而且在中国也只是发生在19世纪和19世纪之后——外国思想便开始取代本国思想[2](p.141)。

观察近代中国的变迁,西方因素无疑是重要参照点,这一点没有异议,因此,列文森强调“西方势力”在近代中国变迁中的作用,无可厚非。问题是,他把西方因素当成解释近代中国变迁的惟一因素,忽视或为其理论预设所蔽,看不到甚至不愿去发现近代中国的传统“源泉”,这就令人生疑了。且不说作为“局内人”的中国的近代史研究者对此难以认同,即使是美国的中国研究者也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批评,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学者柯文(Paul A. Cohen, 1934—)评论道:列文森的近代中国史观“轻而易举地假设是西方单独触发了”中国社会在19世纪的崩溃,而且一直是造成这种崩溃的主要动力,这种观点必然排斥把近代中国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看成是“对年深日久的本土问题所作的反应”的看法,也不会接纳“中国过去文化包含着一些重要的特征,这些特征不仅不会阻碍中国向近

代社会转化,实际上反而会帮助这种转化,并在指导转化中起重要作用”的观点[3](pp.62-63)。因而,列文森的这种近代中国史观是一种有待矫正的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西方中心”史观。

二、儒教衰亡和“传统/现代”、“历史/价值”的张力

儒教衰亡是列文森《命运》一书的基本预设。在列文森眼中,近代中国思想的变迁史是一幅儒教步步后退终至衰亡的画面:从曾国藩的折衷主义,到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从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的论争,到20世纪初民族主义的兴起;从平等地择取“中西之精华”以维护儒教的普遍效用,到将儒教和基督教作为平等的“现代”对立面来恢复儒教在中国昔日的地位;从自由主义与“文化至上论”的保守主义之间的争论,到共产主义理论被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在这一过程中,儒教从作为普世性的价值观,逐步蜕变为中国的“国性”、“国魂”,激进的知识分子进而将儒教指斥为“统治阶级的传统”,并试图重构儒教之外的“人民”传统;儒教文献从经典和历史的预言变成了历史研究的材料,孔子和儒教走下祭坛,变成现代中国博物馆里的陈列物;最后,“东渐”的西方现代“词汇”不仅丰富了儒教中国的“词汇”,而且彻底改变了儒教中国的“语言”。比如,“中体西用”曾是儒教的支持者们为维护儒教地位精心构筑的防卫策略,但“西用”的东来却为作为“中体”的儒教吹响了挽歌。“西学越是作为生活和权利的实际工具被接受,儒学便越是失去其‘体’的地位。这个在没有对手的条件下被视为当然真理的儒学,现在已成为一种历史的遗产,一种不向改变了中国生活基础的西方对手投降的浪漫象征。”[2](p.50)

列文森为其儒教衰亡论作了比较充分的辩护。他在《命运》第二卷中提出:儒教与君主制之间的张力是两者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保持活力的原因,太平天国以降,这条张力链被打断,活力枯竭,双双终结不可避免。他认定,“儒教与君主制之间的这种既相互吸引、又彼此排斥的张力的丧失,是造成中国君主制度瓦解的因素”[2](p.168);同时,“就儒学而言,它始终都需要君主制,并始终都接受它的存在”[2](p.176),因此,当君主制在近代瓦解后,儒教衰亡是其不二归宿。这样,列文森就从儒教和君主制之间关系的角度,为其“儒教衰亡”论找到了根据。在第三卷,列文森继续为其儒教衰亡论辩护:廖平的不同于往昔儒者的“平庸”儒学生涯和近代围绕井田制的争论,昭示儒教已退出了左右现实的历史舞台;“共产主义中国”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研究以及对儒教遗迹的保护,不过是儒教“走入历史”变成“博物馆”的陈列品的象征;儒教在近代中国经历的遭遇,其本质是儒教从作为普世性的历史预言到作为历史研究的材料、从“退出历史”到“走入历史”的“突变”;从“相对主义”的历史哲学来看,儒教绝对的、普世性的“历史意义”在近代的蜕变,是合理的、必然的。

在列文森对儒教衰亡的考察中,“传统/现代”、“历史/价值”之间的张力,是其为儒教衰亡的合理性而辩护的工具。受黑格尔(G. W. F. Hegel, 1770—1831)、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等人关于中国缺乏“现代性”知识的假设的影响(这种假设认为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之间没有逻辑的思想继承的可能,中国传统无法孕育出现代的“资本主义精神”),在列文森的近代中国图式中,横亘着“传统/现代”、“历史/价值”的紧张。科学始终被认为是现代结构的重要构成因素[4](p.134),职业化也是走出古典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列文森眼中,这两个现代性在儒教传统中是缺席的,至多只有偶尔闪现的模糊身影,缺乏不断积累的迈向科学和职业化取向社会的传统,儒教传统与现代性是对立的。这样,他就确立了美国近代中国史研究中的“传统/现代”分析模式。与“传统/现代”的紧张相伴随的,是“历史/价值”的张力。近代中国的尴尬在于,对儒教中国历史的维护与东渐的现代价值的接纳难以两全。要维护儒教中国的历史,只有不断从儒教的价值立场后退,而对来自西方的现代价值的接纳又必须以“历史的断裂”为代价;在感情上对儒教中国的传统及价值难以割舍,但在理性上又必须以西方的现代价值来实现强国梦。由此,列文森断定: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陷入“文

化认同”的危机中,他们为现代对传统、价值对历史的撕裂所产生的沮丧所困扰,这种沮丧要一直等到能证明中国和西方具有平等发展历程的马克思主义“线型”历史发展观被中国接受以后,才能消解。因此,他认为,是马克思和列宁而不是杜威为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摧毁传统所产生的认同危机和沮丧心理“提供了止痛药”[2](p.365)。

儒教的衰亡,在近代中国是不争的事实,问题的焦点不在是否衰亡,而是退出历史、走进博物馆的儒教还能否对现实产生影响,列文森显然将儒教退出历史与其对中国社会的广泛影响一同勾销。从儒教与政治关系的角度看,儒教中国的终结在辛亥革命后已成事实,但从思想影响的持久性来看,则不能认定儒教的影响力随儒教中国的终结而销声匿迹。为化解列文森这一观点的矛盾性,杜维明在《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提出,要区分“儒教中国”和“儒家传统”两个概念,前者随专制政体的解体而消失,后者作为超越性的“终极关怀”,则与现实仍有紧密联系[5](p.4)。

至于列文森将儒教传统与现代中国对立,在中国的历史与现代的价值之间建构张力,仍然是柯文所批评的“西方中心”的近代中国史观的结果。当列文森用西方的“现代性”和现代西方的普世性“价值”来检视中国历史和儒教传统时,就很难不被“传统/现代”、“历史/价值”之间的难以调和的紧张所困扰了。

三、共产主义中国兴起的必然性

列文森通过对儒教在近代中国衰亡命运的考察,得出了一个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冷战时期的美国乃至西方的颇为理性的结论:共产主义中国的兴起是儒教中国衰亡的必然结果。他全面考察了儒教思想在近代中国步步后退的历程后,明确指出:“转换了的和被抛弃了的儒家传统直接导致了反映中国思想变革之结果的共产主义变体的产生。”[2](p.145)儒家的衰亡何以导致外来的共产主义的兴起呢?他分析道:近代中国的反传统主义者因西方的侵略性而在感情上付出了代价,对于集“自我毁灭的痛苦与创造自我的痛苦”于一身的反传统主义者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相对论”就因其能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中国的地位、医治攻击传统所造成的心理创伤而被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由不变之定律所决定的理论得以成为显学。因此,列文森认为,反传统对自由主义者而言是一次代价极大的胜利,“一次替别人作嫁衣的行动”,为共产主义提供了先驱,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信仰失望,促使共产主义时代必然来临,马克思主义者获取了儒教衰亡的胜利果实[2](p.365)。尽管列文森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难称准确,这种解释也不能全面说明共产主义中国兴起的原因,但他所尝试的用思想文化发展理路来解释共产主义中国兴起的研究路向,极具启发性。

列文森还批评了当时其他一些有关共产主义中国的论点。他反对把共产主义中国与儒教中国类比。他认为:共产主义中国的兴起不是中国传统的“天命”轮替,而20世纪50年代后对孔子及儒教遗迹的研究与保护,更不能视为儒教复兴的征兆;他也反对将共产主义中国同共产主义俄国相类比的企图,并指出:在俄国,马克思主义是作为欧洲文化历史一部分的俄国历史文化逻辑衍生的结果,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作为被抛弃的儒家文明之价值的一种补偿”而登场的[2](p.375);他表示:取代儒家的共产党人不会重蹈儒家那个永恒的历史模式的覆辙[2](p.359),“现在还不是开始撰写‘共产主义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的时候”[2](p.381);他甚至相信,共产主义中国在一个多彩的世界里“可能在实际上创造出一个精神世界来”[2](p.381)。把这些观点放在冷战思维及麦卡锡主义笼罩之下的美国及西方社会,我们就会看到,尽管列文森像任何史家一样,“无法完全摆脱在他生活的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某些假设”的影响[3](p.48),我们仍不能不为他的理论勇气和历史研究中的强烈现实色彩所折服。

四、列文森近代中国史研究的两个特点:历史认识主体的凸显和思想史研究的路向

(一) 历史认识主体的凸显

列文森在《命运》一书中,充分凸显了历史认识主体的身影。他充分肯定体现史家主体性的相对主义史观。他认为:“在历史上,相对主义就是一切。”[2](p.347)虽然史家的主体性必然使对“历史意义”的解释出现中性分析和主观性评价的紧张,但对“历史意义”的相对主义解释既是对史家的理性要求,也是对史家的道德规约,他们因此可以获得点石成金的能力,使那些没有价值的东西成为无价之宝。

受这种历史观的影响,列文森的主体性在《命运》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摆脱编年史的历史叙事模式的束缚,对近代中国史的研究不是拘泥于历史细节的考证,而是以其对现代、价值、传统、历史等理论框架的把握为基础,将近代中国史放在“儒教衰亡”的预设框架内进行观照,一部探讨近代中国史的作品近乎成了表达他自己思想的文本,从而使作品具有强烈的哲学思辨感染力,以至于他的那些优秀的中国研究的同行们称其为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其师费正清评价说:“列文森的作品中谈论列文森比谈论中国还要多。”[6](p.332)毫无疑问,历史思维不可能避免主观的影响,当代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沃尔什(W·H·Walsh,1913—1986)断定:“每一个历史学家对于实际所发生的事都有着某种洞见,因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过去都是按他的观点而被显示出来的。”[7](p.115)凸显历史认识的主体作用,可使史家超越编年史的琐屑,但主体性过于彰显史,则难免“以论带史”,忽视那些主体理论预设视野之外的史料的作用,对历史的解释与理解也难免过于主观。列文森对中国近代早期“思想继承性”的考察只着眼于同现代性有关的那些传统,而忽视了其他传统;对儒教传统缺乏“职业化”这一现代因子的考察,仅仅选取宋明以来的绘画传统为例,无视传统的职业分途与发展的意义;为了坚持其儒教在近代中国“突变”的观点,他忽视或否认儒教历史上所经历的各种变化的意义,仅仅将这些变化视为传统内部的变化,而非儒教实质上的转变。这些偏颇无疑是其过分凸显主体性的结果。

(二) 思想史研究的路向

列文森的《命运》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近代中国史,他不仅考察了近代早期的那些与“现代性”相关的思想传统,而且在“儒教衰亡”的总体框架之下,详细分析了随着西方势力的侵入,近代中国所产生的折衷主义、中体西用、近代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保守主义与反传统主义、自由主义与中国的共产主义等思想流派的演进,并考察了儒学在近代中国思想谱系上逐步被“东渐”的西方现代性“词汇”所丰富、改造,终至“语言”被颠覆的历史。即令是对君主制等思想题域以外的话题,他仍然采用思想史的研究路向,他不是从政治、军事、经济的角度,而是从儒教与君主制的关系来分析君主制的终结问题。

如果说,费正清开创的研究近代中国史的“冲击/反应”模式,以研究传统制度、本土叛乱、省一级的发展以及上层政治人物等题域为特点,那么,列文森的“传统/现代”模式则以思想史研究为特色,关注的是在西方冲击下传统思想如何回应,以及历经这一变化的中国人“内在”世界的变化。应当说,这种研究路向能深入传统及近代中国人的内部世界,能更深刻地解释近代中国的变迁,但如果仅仅从思想史入手(如列文森仅仅从思想变迁来检视儒教的衰亡、君主制的终结、共产主义中国的兴起),那么,对历史意义的理解注定是不全面的。

五、列文森近代中国史观的形成背景

列文森的近代中国史观受到以下三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是欧美史学理论。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在20世纪的欧美兴起,并取代19世纪以来独步天下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如实直书”、“消灭自我”式的客观主义史学,转而重视长时段的研究,突出史家的主体作用。受此影响,在列文森的近代中国史观形成的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美国兴起了现在主义史学,强调历史研究应体现历史时代的现在性和不同历史学家个人的主观性,现在主义史学家李德(Congers Reed, 1881—?)认为,历史学家用心中的“某种图式”选择历史材料,并用这个目标来研究社会演进[8](p.165)。《命运》一书对主体性的充分凸显,无疑受到了新史学和现在主义史学观的影响。

第二是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产生于二战后西方经济持续增长的背景之下,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由于战后经济的持续繁荣以及拥抱工业主义的全球性狂热,西方社会思潮乐观地相信,“未来基本上是根据西方工业发展模型拟想的;西方工业文明乃是它的终点”[9](p.28)。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评价道,五六十年代的现代化理论普遍认为:“西方的先进社会已经‘到此为止’;他们的过去之所以令人感兴趣,不仅仅因为它显示了西方的未来,而且因为它为正在从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变而奋斗的其他社会显示了它们的未来。”[10](p.50)美国由于没有受到二战打击,战后一跃而为头号强国,被视为现代化的样板,社会学大师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干脆把现代化过程称为“美国化”过程[9](p.29)。在这样一种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现代化模式顶礼膜拜的时代,“西方中心”必然充斥于学术界,列文森的“传统/现代”模式也不免受此思潮影响。

第三是欧美中国研究的传统。早期西方汉学研究者的中国研究建立在传教士的各种报告、札记、书简之上,中国只不过是他们“想像”中的异邦[11](pp.65-76)。19世纪后,乐观的西方式现代化的普世性逻辑支配了汉学研究。黑格尔认为:“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12](p.23)韦伯相信:儒教缺乏为近代中国培育出现代性的种子,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家所必不可少的才智与精神,“儒教始终是没有的”,“在中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13](p.277)。这些关于传统中国停滞不前、缺乏现代性因子的假设,成为此后西方研究中国的基本预设。对列文森的近代中国史观产生了直接影响的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哈佛学派”,基本是在这一预设下建立起了近代中国研究的“冲击/回应”模式。列文森在哈佛大学二三年级时即受费正清指导,并在此后的学业及研究工作中继续得到费氏的指导,因此,西方中国研究传统尤其是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必然会在《命运》中打下深深的印记。

列文森的近代中国史观在其早年出版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一书中有初步展现。该书着重分析在中西文化碰撞的背景下,梁启超的中西文化观及其所经历的心路历程:19世纪90年代末,梁启超对中西文化持综合主义的态度,并试图用将中国和西方的历史轨迹平等化的方法来为中国文化辩护,从而化解“历史”与“价值”的紧张;1899年至1912年,梁启超从文化主义转变成国家主义,放弃了给西化主张“裹以儒家糖衣”的手法,但仍陷于对历史选择的“理性”与“感情”的冲突中,试图用中西在文化、国家等方面的对等来抚平冲突;1912年至1919年,梁启超仍然因其国家主义主张而深陷历史与价值的冲突中,试图从社会进化的角度,以中西新旧之别来消解冲突;1919年后,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梁启超在价值上回归传统,将中西文化纳入“物质”与“精神”的二元框架中[14](pp.25-65)。在这里,我们看到,列文森《命运》一书中的近代中国史观已经有了比较充分

的展示:《命运》对西方冲击作用的强调,同他在分析梁启超思想变化历程中对西方因素的强调如出一辙;《命运》中展现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负载的文化认同危机,在列文森对伴随梁启超一生的那种在理智上疏离中国传统,但在感情上又依恋中国传统的分析中已见端倪[15](p.79);将梁启超一生的思想变化牵强地视为为弥缝历史与价值的冲突所作的不懈努力的观点,是列文森后来在《命运》中对自己预设框架钟爱的早期实验;在《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一书中所体现的思想史研究路向,则为《命运》一书所继承;费正清在《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再版时所做的“有时我会误以为它是在表述‘列文森近代思想’”[2](p.4)的评价,用在对《命运》的评价上同样准确。

[参 考 文 献]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美国中国学手册[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2]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3]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4]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8.
- [5] 岳华(编).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杜维明新儒学论著辑要[Z].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
- [6] 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 [7] 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8] 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 [9]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10] 塞缪尔·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A].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37-91.
- [11] 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J].清史研究,2000,(4):65-76.
- [12] 黑格尔.历史哲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 [13]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 [14] 崔志海.评海外三部梁启超思想研究专著[J].近代史研究,1999,(3):25-65.
- [15]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徐 枫]

On Levenson's Perspectives on China's Modern History

—Some Thoughts on His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TIAN Zheng-ping¹, ZHU Zong-shun²

(1.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

2.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Central-South Chin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Levenson was the famous scholar who studied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20th century. His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gave macroscopic studies and researches to the modern fate of Confucian China by using special narrating way and fully provided his perspectives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Firstly, the changes of modern China resulted from the Western invasion, which also made an impact on the Confucian school. Such changes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occupations which were lacking in modern Chinese thoughts and the declining of Confucian traditions in modern China were only made

possible when such an invasion cut off all these Chinese traditions.

Secondly, the changes in modern Chinese thoughts gave rise to the declining of Confucianism. In modern China, Confucianism changed from the nation-wide accepted values to China's national spirit and soul, from classics and historical quotations to materials for historical researches and exhibits in museums, from the vocabulary of Confucian China enriched by Western one to the "language" of Confucian China radically changed, and was finally overthrown. Another cause for the unavoidable declining of Confucianism was that the tensio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he monarchy, which had been what kept both vital throughout Chinese history, was broken off in modern China. Accompanying the changes was the tens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nd history and values, which led to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 China and the acceptance of modern values from the West. However, to safeguard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 China must be gradually at some sacrifice to Confucian values. Similarly, to accept the modern values rationally to make China strong must give up some of the traditions and values of Confucian China.

Thirdly, the rise of Communist China doomed the outcome of declining Confucianism. It was the conclusion that Levenson reached after systematically observing how Confucianism declined in modern China. Furthermore, he believed that Communist China was neither the transmi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a nor the equivalent of Communist Russia.

Fourthly, Levenson's research into modern China featured two characteristics. One was his works about China's modern history being his own text of expressing his thoughts by emphasizing the subjectivity in his historical cognition, and the other was his way to do research on history of thought, which was of help to his further study of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e inner world of modern Chinese to profoundly interpret the changes of modern China.

Fifthly, the formation of Levenson's perspectives on China's modern history was influenced by three factors: New Historicism represented by the chronologist school and the theory of American presentist historiography; the Modern Theories that rose in western countries after World War II; and some hypotheses of Western scholars that the Chinese tradition lacked modernity. Levenson's perspectives on China's modern history could find some expression in his earlier publication named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Key words: Levenson; perspectives on China's modern history; Confucian China; modern fate

本刊讯: 2003年11月24日下午,日本名古屋大学原教育科学部部长(现名誉教授)、爱知淑德大学社会学部部长江藤恭二教授应邀在浙江大学教育学系作《近代日本与世界各国的教育交流——以外籍教师和留学生为中心》的学术报告。教育系中外教育现代化研究所成员及全院教育类硕士、博士研究生参加了这次报告会。

本刊讯: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创建于1983年,目前已走过了20个年头。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系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联系的4个古典文献专业之一,也是浙江省重点学科,以该专业教师为主组建的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